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20.04.011

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 历史图景及其成就

李兴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 历经曲折探索(1949-1976)、恢复开拓(1977-1999)、创新深化(2000年以来)等阶段,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回顾历史, 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取得全方位发展成就: 整体规模不断扩大, 教育层次不断提高; 教师队伍持续壮大, 实现代际交替; 课程体系逐渐完善, 教材建设成果丰硕; 教学设施和行业组织逐渐成为学科发展重要支撑; 教育改革坚持加强学科制度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紧贴时代脉搏, 始终保持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 不断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传播人才。

关键词: 新中国; 新闻传播教育; 发展历史; 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20)04-0086-09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经过百年努力经营已蔚然大观, 其中新中国成立70余年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尤令人瞩目, 在教育规律、业界变化、社会需求三种逻辑的统一结合中, 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创新发展, 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回顾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历史进程, 总结发展成就, 可为新时代下媒体融合格局中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提供重要资鉴。新闻传播教育遵循教育事业总体发展规律, 与之相应, 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应当遵循教育学基本原理。教育制度的规约下, 教育者、课程、教材、教育配套设施等构成教育活动的核心要素。本文在回顾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历史轨迹的基础上, 总结新闻传播教育活动各项核心要素及相应学科制度的发展成就, 力图展现70余年来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整体历史图景。

一、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发展阶段

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先后经历曲折探索(1949-1976)、恢复开拓(1977-1999)、创新深化(2000-至今)等阶段, 各阶段中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 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

在曲折探索阶段(1949-1976)中, 新闻教育解决的是破后而立、重新建立发展基础的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发展教育应当“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①教育部门也制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 吸收旧教

收稿日期: 2020-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

作者简介: 李兴博, 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教育史。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献》, 山东: 新华书店出版社, 1949年, 第16-17页。

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工作方针。^①在此背景下，全国新闻院系迎来大范围调整。以优化结构、合理布局为目的，撤销或归并了部分不符合社会主义办学精神的新闻教育单位，同时根据条件创办新的教育机构。^②

1952年，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和暨南大学的新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并入江苏文化教育学院后停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也在1953年停办。1958年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后，形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为核心的新闻教育格局。三所院系成为新中国发展新闻教育的基础，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主要力量。

调整院系布局的同时，全面学习苏联新闻教育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新闻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旧中国的新闻教育理念和内容显然不再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学习苏联新闻教育经验成为短时间内建设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的有效举措，具体方式包括聘请苏联专家，引入苏联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翻译苏联教材，派出留学生和访问团等。

1949年至1966年间，新闻教育事业取得较大进步，但在“意识形态”挂帅情形下，正常教学秩序也遭受了一定冲击。到了“文革”时期，各新闻院系停招停办，虽然“文革”后期重新恢复并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师资、教学环境远不如从前。

恢复开拓（1977-1999）阶段，新闻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革”期间被迫中断造成新闻人才奇缺，而新闻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新闻人才，在这种形势下，新闻教育事业逐渐复苏，并进一步开拓。^③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北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的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北大新闻专业重新并入人大新闻系，郑州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新建新闻系（专业）。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杭州大学、江西大学的新闻系相继恢复。

1983年8月，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发展新闻教育事业，要考虑新闻事业发展需要，同时考虑实际可能；保证重点，发挥原有院系潜力的同时，要积极规划新专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这成为新闻教育工作的核心指导原则。1994年7月，中宣部等部门再一次召开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肯定之前成绩的同时，提出深化改革、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做好在职教育等要求。在两次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新闻教育事业建设通过扩大招生人数、增设新专业点、改变专业单一状况、多层次培养新闻干部、加强在职新闻干部培训工作等多项举措，开创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新局面，形成了从新闻学延伸至广告、广播电视、出版、公共关系、新媒体等诸多领域，从职业教育到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再到博士后培养的综合新闻传播学科教育体系。

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内外格局发生巨大变动，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需要，深化改革势在必行。此轮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技术驱动特点，各新闻传播院系力图紧跟互联网技术进步的步伐，调整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的同时，不断将技术进步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力求在技能培养上与业界需求保持一致。各院系主动适应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格局。^④

新格局下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在“部校共建”政策的推动下，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8页。

② 肖东发编《新闻学在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③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1页。

④ 邓绍根、李兴博《百年回望：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55-164页。

为指导思想和核心教育内容,及具有全媒体新闻传播知识和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实施学界和业界互聘计划,优化师资结构;课程体系和内容也适时调整,与培养目标契合。新闻传播教育事业整体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

二、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层次不断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开创的新闻教育事业和旧中国原有的新闻院系构成了新中国新闻教育的主要来源。改造调整后的新闻教育格局中,除人大、复旦的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外,数所培养在职干部的新闻学校相继成立。1949年11月,新华社新闻训练班改建为北京新闻学校,直属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兼任校长。1951年10月,中宣部成立宣传干部培训班,主要培训地、县两级的宣传部长,和分配到中央宣传部门的大学毕业生。1954年9月,中央马列学院新闻班(后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开办,《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兼任班主任。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高校新成立一批新闻系(专业),主要有:杭州大学新闻系(1958)、江西大学新闻系(1958)、南京大学新闻专修科(1958)、暨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山东大学新闻专修科(1960)、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1960)、安徽广播电视学校(1960)、江苏省新闻专科学校(1960)、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4)等。

民国时期改造而来的新闻院系和上述新建院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早期新闻教育事业的主要力量。这些新闻院系短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新闻宣传人才,契合了国家对新闻宣传人才的大量需求。据罗列统计,至1959年,全国新闻院系共有学生1700名左右,各新闻教育单位为新闻战线输送的新闻干部近两千名。^①

“文革”结束后新闻教育事业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1982年全国本科一级的新闻教育单位达到了14个。1983年,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先后增设新闻系(专业),全国设立新闻专业的院校达到21所,提前实现了当年召开的全国新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九八五年前原各大行政区至少应有一所高等院校设置新闻专业。此后,争取在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凡是有条件的综合大学,都逐步设置新闻专业”^②的要求。同时,研究生教育也重新起步^③。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下,全国迎来了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热潮,新办专业数量持续增加,专业种类不断拓展。至1992年,全国设有新闻学类专业教学点的普通高等院校有52所,共设新闻学类专业77个,其中包括新闻学专业39个,国际新闻专业6个,广播电视新闻专业9个,广告学专业21个,播音专业1个,体育新闻专业1个。^④

研究生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1981年高等教育开始实行学位制,人大、复旦和中国社科院率先取得新闻学硕士授权点,此后在1986年、1993年、1998年,先后共有22所新闻院系取得新闻学硕士点。1985年,人大和复旦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博士,1997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后,两所学校均获得一级博士授权点。至1999年底,全国共有新闻学与传播学硕士

① 罗列 《十年来的我国新闻教育》,《新闻战线》1959年第18期,第18-2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新闻年鉴(198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③ 196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招收过两名硕士研究生,“文革”开始后研究生教育被迫终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等六个方向的研究生共85名,人大新闻系招收8名新闻学研究生,复旦新闻系招收4名新闻学研究生。据统计,1983年全国新闻院系共有教师518人,学生共计2814人,其中本科生1877人,研究生177人,进修生380人,函授生380人。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中国新闻年鉴(198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④ 李建新 《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授予点 23 个，博士授予点 6 个，博士后流动站 1 个。^①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截至 2015 年，全国共有 681 所大学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约占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学校拥有 1244 个新闻传播专业点，在校本科生规模 22.6 万人。到 2019 年，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本科高校达到 721 所，本科专业 1352 个。^②

博、硕教育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博士授权点经过 2006 年、2010 年、2018 年多次递增，目前共有一级授权点 26 个，挂靠博士点和交叉学科博士点 17 个。博士点的分布也趋于完善，除西藏、青海等少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硕士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至 2018 年全国共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125 个；2010 年以来专业硕士点从无到有，规模迅速扩大，2018 年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点共计 165 个，出版专业硕士点共计 17 个。^③

三、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实现代际交替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活动中知识的创造、传授大都藉由教师实现。有论者提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新闻教育工作者已历经四代，其中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参加工作的为第一代，50 年代末至“文革”结束前参加工作的为第二代，改革开放后毕业或从其他领域转向新闻教育工作的为第三代，新世纪以来教师队伍来源更为广泛，博士所占比例持续提高。不同时代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因其所处时代和经历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④

第一代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来源较为广泛，既有从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如范长江、安岗、罗列、王中、陈望道等，也有建国初期新闻院系毕业分配到新闻教育单位工作的大学生，如方汉奇、秦珪、何梓华、郑兴东、王泰玄、徐震、丁淦林等，还包括民国时期就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如蒋荫恩、张隆栋、赵敏恒、汪英宾等人。第一代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为新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新闻宣传人才，同时第二代新闻教育工作者也在他们的教导下逐渐成长起来。虽然 1958 年后各地高校成立了一批新闻院系，但大都是匆匆上马，几年内纷纷停办。所以前两代新闻教育工作者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院系中。

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研究生教育迅速恢复，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王中、方汉奇、郑兴东、甘惜分、宁树藩、丁淦林等人成为第一批博硕士生导师，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三代新闻教育工作者。全国各地高校短时间内恢复、新建一批新闻系(专业)，需要大量教师填补空缺，所以第三代新闻教育工作者的构成更加多样。既有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任教的新闻系及相关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也有从中文、历史等学科转任的教师和从业界投身学界的新闻工作者，还有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博(硕)士。教师构成多元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各校的新闻系(专业)中普遍存在，兰州大学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刘树田回忆，1984 年创系时，从新闻单位和校部机关过来的教师加上中文系分过来的教师，建系之初教师队伍共有十几人；^⑤ 80 年代初期的暨南大学新闻系，“共有十几位老师，他们并非都是新闻学专业的科班出身，但大多数都有过新闻实践经验，都是来自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⑥。

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二代教师陆续退休，第三代成为各新闻院系科研教学的中坚力量，同时第

① 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80 页。

②③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798-809 页。

④ 艾红红、冯帆《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群体特征探析》，《新闻爱好者》2018 年第 10 期，第 19-22 页。

⑤⑥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49、455 页。

四代教师逐渐成长起来,成为教学中的骨干力量。第四代教师普遍学历较高,拥有博士学位,前往海外进修或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近几年随着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日渐频繁,拥有心理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学科背景的博士开始进入新闻传播学科教师队伍。“部校共建”全面推广后,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交流“千人计划”开始实施,业界人士大量走进高校课堂,进一步充实了新闻教师队伍。

新中国的新闻教师队伍最初主要集中在人大、复旦和北京广播学院三所学校;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在职新闻教师共有1011人,其中教授132人,副教授352人,讲师358人,助教137人,其他32人;^①至2014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在全国共有专职教师6912名,副教授级以上职称的教师2975名,比例达到43%;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2984名,比例也达到43%。^②新闻教师队伍规模逐渐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代际的延续和更迭保证了这支队伍始终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来自业界和其他学科的人不断进入队伍,实现了学科之间、学界和业界间充分交流的同时,也成为这支队伍的活力所在。

四、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逐渐完善,教材建设成果丰硕

在教育活动中,课程是核心要素之一,整个教育活动过程即是教育者依照教育目的,以特定的教育形式和教学设施的支持,向受教育者教授具体的课程内容。由各类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教材共同组成了教育内容的主体。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大致分为“文革”结束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初期新闻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反映在课程上主要是政治思想课程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如195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政治思想课程占15%,1951年中宣部召开新闻教育课程改革会议,根据各方面的讨论意见将复旦新闻系的课程设置为:政治思想课程约26%,新闻业务课程约40%,文化知识课程34%。同时压缩专业课程,1954年复旦新闻系将原有《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图片宣传》合并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将《评论写作》并入《新闻写作》;1956年下半年系主任王中取消了《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并亲自讲授《新闻学原理》《评论写作》和《新闻专题》,但随着王中被打倒,新闻系的课程设置思路又回到老路上。^③1961年的课程中,采、编、写被合为《新闻采访编辑写作》一门课程。^④

与课程相应,一批苏联的新闻学教材、大纲被译介到国内。1951年,新闻总署办公厅编译了《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之后《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续编》《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二集)相继出版。1954年北大新闻教学研究室翻译了《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次年又翻译了《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大纲》。1955年春,苏联基辅大学新闻系主任伊·尼·斯洛保加纽克担任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顾问,在授课时编写了两本讲稿,后经修订出版,分别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苏共报刊史概要》。1956年人大新闻系翻译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出版。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共有31本苏联新闻学著作翻译出版。这些苏联新闻学教材、大纲和著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新闻学教育的主要理论支撑。

①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25页。

③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1-192页。

④ 方汉奇《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国内新闻院系自编的讲义中,新闻史类数量最多,如多个院系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复旦新闻系部分教师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人大新闻系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等。此外各新闻院系还编印过一些采访、写作、编辑等课程的内部讲义,供教学使用。

“文革”结束后,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全面恢复,新闻学科也逐渐回归到按新闻学规律和教育规律开展教学工作的道路上,形成了包括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论文(作品)在内的课程体系,其中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通识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类课程。综合、理工、师范、民族、体育等不同类别院校的新闻院系在课程设置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以新闻学概论、中外新闻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课程为主的核心专业课程基本一致,且持续至今。随着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专业加入,新闻传播学科增加了广播电视概论、广告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课程,各专业也都发展出自己的核心专业课程。

互联网时代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的主流趋势,各新闻传播院系适时改革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中不断整合原有课程,根据技术的发展方向增加新课程;调整课程结构,保留核心课程的同时,增加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的课程。据相关研究者选取55家新闻院系所做的调查,近5年内(截至2018年)有82.42%的院系增加了新媒体技术类平台课程,71.89%的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变化不大。^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课题小组在调查了18家主流新闻院系基础上做出的调研报告显示,各院系的培养目标上都包含了“通过跨专业、跨学科培养拥有广博的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深厚的人文修养、全面的专业技能,富有发展潜质的新闻传播人才”之类的内容,在课程设计上大都通过“选修课或副修、跨学院联合培养的形式,融入其他学科的课程”。^②

新闻传播教材建设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也形成庞大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规划教材、院系编写系列教材、个人编写教材三种类型。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新闻学教材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建设工程,此后“十五”至“十二五”新闻传播学科出版大量教材,基本实现了学科内各专业、课程的全覆盖。新闻院系也组织编写系列教材,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编写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复旦博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等。

五、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设施科技化水平迅速提升, 行业协会不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广义的教学设施指开展教学工作必需的物质资料,新闻传播教育所需设施除了和其他学科共享的图书、报刊资料外,开展实践教学所需的各类实验室及配套设备是其核心教学设施。虽然新闻传播学科历来强调实践教学,但因技术限制、相关认识不足等原因,配套教学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更新,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新闻传播学科实验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式发展。行业协会作为学科内开展管理、指导、交流工作的平台,相关建设也逐步完善,各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不断提升组织协调作用,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教学设施和行业协会逐渐成为贯穿新闻传播教育全过程的重要支撑。

^① 周茂君、罗雁飞《我国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研究——基于55家院校调查数据》,《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第157-168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教育课题小组《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基于18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第123-134页。

早期的新闻实验室设施设备较为单一,主要配合摄影、报刊编辑、印刷等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各主管部门对所属新闻院系的办学条件要予以足够的重视,拨出专款和一定数额的外汇,给他们配备所需的现代化教学和实习设备。^①部分院校新增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随之扩充实验室和教学设备。如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在1984和1985年成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并建立广播电视实验室。一些实力雄厚的新建院系在成立之初实验室建设就取得较高的水平。1983年建立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创建不久便进口全套索尼公司广播三管摄像机、录像机、编辑机、监视器等设备,1988年又建成一个中等规模的演播室,此外还建成广播实验室,购置近20套录音、编辑设备,短时间内在国内同行中达到领先水平。^②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新闻传播学科实验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实验教学水平大幅提升。为进一步推动高校实验教学改革,促进优质教学资源整合共享,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于2005年启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传媒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审工作从2006年开始。当年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中心成为第一家建设单位,此后三年又有中国传媒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15家单位的传媒类实验教学中心获批成为建设单位。2009年教育部开始对在建的传媒类实验教学中心示范单位开展验收工作,到2012年获批的16家建设单位全部通过验收,正式挂牌为国家级示范教学中心。同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三家单位的传媒类实验教学中心成为新的建设单位。^③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闻传播学科紧跟国家导向和行业发展动向,为使适应移动互联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传媒环境,融媒体实验室建设成为各新闻传播院系改革的重头戏。各院系紧跟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云计算、大数据、VR、AR、5G等技术从实现产业化到纳入融媒体实验室建设的时间明显缩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先后与多家单位合作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亚信媒体融合实验室”“区块链媒体实验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5G融媒体实验室”等都是高校融媒体实验室建设的代表。

据统计,至2014年,全国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室数量达到1191个,总产值85498.11万元。^④2019年科技部批准成立了四个传媒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中国传媒大学,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标志着新闻传播学科实验室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新闻传播学科行业协会主要包括管理组织和民间团体性质的学会,前者主要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行业学会则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等。除全国性的团体组织外,部分省市也成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学会。

管理组织中成立最早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198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学科评议组,负责全国学位授予单位的审定工作。次年6月,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正式成立。当时新闻学只是文学门类里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评议组成员只有王中一人。1997年新闻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后,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从第四届开始单独设立,第四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② 申凡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③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27页。

届学科评议组共三人，包括方汉奇（召集人）、赵玉明、丁淦林。如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已至第七届，成员也扩充到七人。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组织章程》规定，学科评议组的主要任务包括：就本学科重大问题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供咨询或提出建议；评议审核新增、调整和撤销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学科；对调整学科目录提出意见或建议；参加质量检查和监督等。^①

1997年教育部组织成立第一届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和开展本科教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就专业、教材、课程、教学实验室、教学改革等领域的建设工作向教育部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制订专业规范或教学质量标准；承担本科教学评估和专业设置的咨询工作等。2018年新一届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任期至2022年。2011年成立的第一届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则是为指导、管理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教育而设，自成立以来已完成多项重要工作。

与行业管理组织不同，学会作为行业内部单位和个人自发组织的团体，主要起到交流平台作用。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组织学术研讨会，调查全国高校新闻院系的基本情况，组织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配合教育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定位为“专门研究中外新闻传播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外，还利用会员多、分布广的优势，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类史料搜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纂《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如今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离不开设备完善、功能强大的实验室开展实践教学，同样依赖于各种行业协会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开展学科内的指导、管理、交流工作。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设施和行业协会，从学科的辅助要素逐渐融入学科建设全过程，成为愈发完善的新闻传播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坚持加强学科制度建设， 培养社会所需的新闻人才

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自其诞生以来便持续开展。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习苏联时期，国内新闻院系意识到“苏联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因此在移植过程中作出部分调整。如北大新闻专业的课程并未完全按照苏联教育部审定的《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大纲》设置，而是努力创立有新闻专业自己特色的系列课程。^②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学科坚持加强学科制度建设，通过规范办学条件、制定教学标准、动态调整专业等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新闻人才。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教育事业出现超常规发展现象，教育部多次提出新闻学类专业属于长线专业，今后要适度控制发展规模，应在现有专业点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毕业生的质量。为此新闻学学科教指委向教育部提交《新闻学类专业基本办学条件》咨询报告，主要内容是对成立新专业应具备的条件提出建议，供教育部审批新专业时参考。^③

2000年9月，教育部下发《新闻学类专业基本教学条件》的通知，针对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

^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组织章程》，2018年4月19日，http://www.moe.gov.cn/s78/A22/A22_ztzt/ztl_03/gzwj/201804/t20180419_333620.html，2020年3月2日。

^② 余家庆等访谈整理《中国教育口述史（第2辑）——罗列教授等亲历新闻教育往事回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③ 何梓华《新世纪新闻人才培养之我见》，见钟期荣主编《经济全球化与跨地区文化传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提出了师资、教学方案、教材、图书资料、专业实验、校外教学实习基地等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2009年,教育部下达制定专业规范的通知。教指委指导分工,将新闻传播学所属五个专业交给各新闻传播院系具体负责。2009年10月,专业规范全部定稿,并上报教育部。^①2013年10月教指委启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并将其列为重点工作。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多轮研讨与论证,2017年底向教育部提交定稿。2018年《新闻传播类教学质量标准》正式发布,成为全国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入门标准。与“国标”相配合的本科专业认证^②也从2017年开始实施,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中山大学新闻学专业、暨南大学新闻学和广告学专业作为首批试点率先完成认证。根据教指委部署,未来将在“国标”的基础上推动全国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的认证工作。^③

为规范研究生培养工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编写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条件》(以下简称《申请条件》),经过两次修改后于2016年6月提交到教育部,该《申请条件》将成为学位授权点申报的入门条件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重要参考。新闻与传播硕士在论证阶段就注重规范建设,形成了《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草案)》和《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草稿)》,为专业建设、招生、课程设置提供了基本依据。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成立后,又完成《新闻与传播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并着手完善培养方案,进一步规范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工作。

专业的增减调整是新闻传播学科开展改革的重要举措,根据社会需求和实际办学情况不断调整专业设置,是学科良性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除北京广播学院外,各学校的新闻系普遍只设新闻学一个专业,1983年后部分高校开始增加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国际新闻等专业。1987年本科专业设置纳入国家统一管理。1993年教育部修订本科专业目录,新闻学类共设六个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学、国际新闻、播音、体育新闻;1998年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后增加传播学、媒体创意专业;2012年教育部再次修订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类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专业,后又新增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等专业。

办学条件、教学标准、专业设置等领域的改革措施是从规范化的角度出发,开展学科制度建设。此外,面对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媒介生态格局的持续变动,中宣部、教育部牵头实施的“部校共建”和“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成为近些年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

200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试点单位,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达成共建协议,成为首个实施部校共建的新闻院系。2013年12月20日,中宣部、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其部校共建经验,指导全国十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与当地高校签署共建协议。此后部校共建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广,根据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重点建设一所新闻学院。2017年两部又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至2017年底部(媒)校共建新闻教育单位达到100所左右。到2018年8月,全国计有共建新闻教育单位120所。^④

(下转第116页)

^{①③}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64-565、329页。

^② 专业认证是由专业性认证机构对专业性教育学院及专业性教育计划实施的专门性认证。通常由专业性认证机构会同专业领域的教育工作者一起进行。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专业认证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首先在工程教育类专业试行。2015年开始,教育部在理学、人文社科等领域试行专业认证,由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组织开展。

^④ 马星宇、周宗龙《扩张与深化:部校共建的现状与趋势》,《青年记者》2019年第11期,第111-112页。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办报模式的演进应继续坚持、不断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加快推进报刊“企事分开”的步伐,既保持机关报刊的主流地位,也促进其他报刊的加速发展。同时,面对我国文化软实力、舆论影响力与经济硬实力、世界大国地位严重不匹配的局面,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坚持媒介融合发展路径,进一步增强报刊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打破“计划模式”残留的地区封锁、条块分割的市场壁垒,以技术、资本、市场为手段推动报刊资源的深度整合与优化配置,实现跨国境、跨区域、跨产业发展,打造国际化、集团化、多元化的文化产业集团,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对内凝心聚力、增强自信,对外塑造形象、扩大影响,不断将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林春香)



(上接第94页)

与部校共建配套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也在2013年开始实施,该计划不仅为部校共建提供政策支持,还为共建新闻教育单位规划了发展方向,即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核心,加强学界和业界交流,探索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模式。该计划首期已于2017年结束,2018年10月“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版开始实施,相关指导意见对部校共建、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细致的措施。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在师资、课程、教材、教学设施、行业协会等方面的建设上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成就。在教师群体一代代地传承中,优秀的教育精神不断延续,新的血液注入其中,整个群体始终保持发展活力。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课程长时间保持稳定,成为新闻传播教育根基所在,课程的增减和结构的调整则是学科根据社会需要适时调整培养目标的直接反映;与课程配套的教材经历了引进苏联教材到编写系列教材的过程,已经实现学科内各专业各课程的全覆盖。教学设施和行业协会同为开展教学工作的重要支撑,在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实验室的地位愈发重要;行业协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学科内部开展管理、指导、交流工作的主要平台。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坚持创新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学科制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源源不断地培养符合时代要求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新中国发展成就和改革经验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建设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培养能够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行业创新发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新闻传播人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林春香)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vertic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authority , horizont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are the path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sharing ,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 and a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xecution are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Logical Evolu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Will Not be Corrupt”

HUANG Qing-bo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 especially the strength has been deepening , the scope has been expanding , and the conditions and space for the growth of corrup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squeezed. By exploring the deep meaning of “will not be corrupt” at the macro , meso and micro levels , combing the logic evolution of “dare not be corrupt” “can not be corrupt” and “will not be corrupt” , this paper divides “will not be corrupt” into four levels “uneasy corruption” in mentality , “unnecessary corruption” in cognition , “unwilling corruption” in will ” and “ disdainful corruption ” in position. Based on this ,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dimensional path construction of all-round supervision , all-factor incentive , all-process control and all-coverage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The Researching Path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NG Shao-gen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Reviewing the researching path ,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y are the zigzagging time , the restoring time , the reflecting and innovating time and the prospering time. Although the achievements are fruitful ,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shortcoming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PRC should consistently basing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nd making impro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parts: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strengthening macro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promoting the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ork;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comprehensively , systematically and objectivel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Xing-bo

Abstract: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gone through many stages , such as tortuous exploration (1949-1976) ,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1977-1999) , deepening innovation (2000 to now) . It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overall scale continue to expand; education level continue to improve; teachers group keep growing , which have re-

alized intergenerational alternati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fruitful; teaching facilities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subject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reform insist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of new China keeps pace with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lways maintains the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nd constantly trains talen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ppearance”, “Withdrawal” and “Return”: “Trilogy” of Development of Cable Broadcasting in the Countryside in PRC

AI Hong-hong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mass media including press, radio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cable broadcasting has advantages over them with the lowest cost, the easiest access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many people listen to it. These advantages enable cable broadcasting to be the best option for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overna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A great many of cable broadcasting station were built befor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adopted in 1978, which hel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rectly connect with rural population. What's more, peasants could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will and rural traditions. But some cable broadcasting stations “withdraw” from the countryside since 1978, owing to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dependent choice of peasant themselves recognized by public power. As state-owned media and agriculture policy being adjusted in recent years, cable broadcasting, however, is widely covered in the countryside with a strong momentum, loudspeakers and small cable broadcasting stations being built once again in plenty of villages. This leads to a transformation from “broadcasting to rural population” to “countryside broadcast”, which embodies the concern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untryside in particular for those vulnerable groups. “Trilogy” of development of cable broadcasting in the countryside in PRC is not only an epitome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but also a media metaphor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E-commerce Operators

ZHENG Jia-ni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 counterparty's right to know and promote information flow,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E-commerce operato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event fraud, realize fair transaction, promote orderly competition and achieve effective regulation.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can be demonstrated from following aspects: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bstract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ntrol power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E-commerce operators is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inform obligation and the notification obligation, but it has not yet broken through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ontract law.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E-commerce operators includes subject qualification information, trading rules, commodity and service information, etc. Remedy measures for breach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of E-commerce operators include continued performance, liability for contractual negligence, contract validity denial mechanism, and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